

doi:10.3969/j.issn.1672-4348.2018.05.008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道路的主要特征

叶琛

(福建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8)

摘要: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走出了一条极具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整体上看,中国道路具有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塑团结有力的内聚性共同体;二是打造负责任的有效政府,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导向相结合;三是注重中国特色,坚持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四是突出人民主体性,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五是强调独立自主,又积极融入世界发展潮流;六是利用“试点”实践,走渐进式的改革发展道路。

关键词: 中国道路;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主体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18)05-0452-06

Main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way in the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YE Chen

(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18, China)

Abstract: In the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come through a socialist development way with its own featur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Party). On the whole, the Chinese way has very clear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features of the time: firstly, 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forming a strongly cohesive community; secondly, building a responsible and effective government, adhering to the combination of government dominance and market orientation; thirdly,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ticking to and developing socialist system; fourthly, highlighting the people-centered theory, and seeking benefits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people; fifthly, emphasizing independence, and actively integrating into the world trend of development; sixthly, using the “pilot project” practice, and taking the way of progressiv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Chinese way; the Party's leadership; government dominance; socialist system; people-centered theory

1978 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新征程,至今已整整 40 周年。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发图强,开拓创新,发展出了一条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0 年的实践证明,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民幸福的正确选择,

是适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总体上看,中国道路是对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一种回应,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整个时代发展趋势探索出的既区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又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

收稿日期: 2018-06-27

基金项目: 福建工程学院科研启动基金项目(GY-S18003)

作者简介: 叶琛(1980-),女,福建古田人,讲师,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外政治制度研究、比较政党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塑团结有力的内聚性共同体

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是中国道路最本质、最鲜明的特征。关于这一点,近年来越来越为专家学者们所认识与重视,甚至一些西方学者和媒体也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看成是决定中国道路发展的重要性因素。从中西政治比较的视野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意义及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与西方的执政党及其政党制度都存在着实质性的不同,这也是中国道路取得当前成就的一个重要保证。

(一)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道路的领导核心,是维系与动员社会的超强力量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与西方的执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是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过程中上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广大人民的领导核心,成为凝聚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主心骨。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核心,是中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发展的需要。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各区域间差异性很大,多民族、多文化共生并存,社会群体的要求也复杂多样,再加上中国自秦朝以来形成的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主义传统,都要求中国要有一个相对稳定并为社会各方所接受的政治权威来凝聚和整合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以其先进性和代表性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重任,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权威现代化的载体。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道路的领导核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需要。根据亨廷顿等人的研究发现,后发国家由于现代化起步较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和试图解决的往往是西方发达民主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经历的事情。“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时发生。”^[1]作为后发国家,中国要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带领人民实现现代化目标,必然要应对各种各样来自现代化的挑战,因此十分需要有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核心领导,坚强有力地凝聚力量,保证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稳定。比如,单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区差异问题,如果处理不好都会对现代化进程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不可否认,当前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存在较大的区域差距,但正因为有

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通过更大力度的转移支付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从而缩小地区差距,才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发展良性互动循环机制。可以说,在中国道路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核心力量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中国共产党超强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凝聚着全国各族人民对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支持,通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发展,成功地在国际上重新塑造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

(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和谐团结合作的政党关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并巩固下来的。与西方的政党制度有着明显的不同,我们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实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理论与实践创新。众所周知,西方国家主要实行两党制和多党制,各个政党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主要通过议会选举或总统选举进行竞争,是一种竞争性政党体制,相互之间容易形成你上我下、你死我活的政治反对关系或讨价还价的政治妥协关系;同时,政党竞争也容易导致社会内部的分裂与大量社会资源的消耗,特别是像萨托利在《政党与政党体制》中指出的,如果多党体制下“政党分散化”倾向严重,政党间向心力受阻,还容易对一国的政治稳定带来不利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西方政党之间利益斗争与分裂的弊端。在这一政党制度下,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八大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领导与合作的关系,相互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性关系,而是共存共荣的合作性关系。这一制度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的发挥,从而形成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以民主党派和政协为支点的政治网络,进而把党内党外的各种力量团结起来,把社会上大部分发展资源调动起来,围绕中国道路的共同目标团结、协作、奋进。

二、打造负责任的有效政府,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导向相结合

(一)建设负责任的有效政府,保障经济社会的长期有序运行

在西方学者眼中,中国政府常常被视为一个高效的强政府,比如福山就认为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一个高质量的政府。这是中国道路呈现出一个特色,也是后发国家推动现代化顺利进行的客观需求。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通过综合分析指出,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为保证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必须要有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秩序作保障,倘若离开这一基本秩序保障,其经济发展就容易遭遇各种各样的困难。从当前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看也确实如此。许多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国家,比如肯尼亚、利比里亚、海地等国家,其现代化之所以遇到挫折,往往由于其缺乏一个有效的政府,无法为现代化提供一个正常的社会政治秩序。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提供和保证这一秩序的任务自然地落到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肩上。中国政府的权威使其有能力在社会权力开放的同时把国家权力集中起来,并通过中央和各级政府实施有效治理,保证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性 and 连续性。因为,“工业体系的建设需要一个国家在政策上保持较强的连续性,不能动不动就‘翻烧饼’。而如果政治内耗严重,有利于民众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治国思路得不到连续的施展,工业化进程止步不前,国力也就很难得到提升。而一个手中缺乏资源的政府,在保障人民权利方面也必然难有作为。”^[2]

西方的政党体制,容易在社会出了问题后出现前后任政府相互推诿的局面,同时公民也可以通过选举变换执政党来缓解与调和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矛盾冲突。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则要求中国的政府应该是一个负责任、能担当的政府,要有科学的判断力和长效的执行力,能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福山看来,选举是使政府负责的一种路径和方式,但不是唯一路径和方式,在不存在竞争机制的情况下,更多需要一种道德责任机制,即政府要有一种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内在道德要求。而这种道德责任机制正好是中国政府

的又一个特色。

(二)政府主导,寻求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的最佳结合

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是自发形成的,发育得较早,形成和发展经历的时间也比较长,整个社会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所以在经济发展中主要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主要作用,政府对经济比较少进行干预,其作用主要通过立法等手段保证经济的自由运行。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主要实行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初期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也很不成熟,整个社会又刚刚经过“文化大革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遭受了重大破坏,因此,需要政府作为一种超社会力量参与和经济发展中来。整体上看,过去4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由上到下推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起着主导和调控的作用。实践证明,政府强大的主导作用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同时,我们也对原有计划经济的弊端进行了深入的反思,逐步摆脱旧有把计划、市场和社会制度相挂钩、相等同的观念,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有机地结合起来,探索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有效结合,避免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状况。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由于政府强有力的引导,并激发社会与市场的力量,才能够在全球化条件下取得今天的成就。当然,我们在中国道路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谨慎地对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地调整二者的关系,形成在微观经济领域政府逐渐放权、在宏观经济领域政府强化主导作用以保障市场决定性作用发挥的发展方向,在动态发展中谋求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的最佳结合。

三、注重中国特色,坚持与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的发展关键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摆脱原有的僵化认识和各种教条主义的束缚,开拓创新,兼容并包,在理论思考与实践摸索的基础上,以一种务实的方式达到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与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性的统一。中国道路的成功探

索,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提供了西方现代化道路以外的另一种道路借鉴,丰富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

(一) 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彰显中国道路的根本特征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道路区别于其他国家发展道路的根本特征。在中国道路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始终坚信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坚信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带领中国实现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3]166}“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3]133}即使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巨变、全球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同时,我们不停留于固有的关于社会主义具体模式的认识,抓住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深刻而理性的探讨,从而得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373}的科学认识,并强调与其他社会制度下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不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牢牢抓住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共同富裕为中国道路的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区分开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实行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区分开来,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了对苏联模式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认识突破。过去40年,超过7亿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过去5年,超过6800万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当前,中国精准扶贫的步子越走越坚定,预计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将实现全面脱贫。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不仅彰显了中国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性,也向世界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

(二) 实事求是地进行制度创新,赋予社会主义制度新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的同时,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方法论,把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经典社会主义道路最基本的不同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前提条件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步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典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则基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情况。另外,苏联关于社会主义模式探索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和弊端,并最终走向解体,无法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可供借鉴的实例参考。这些都决定了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实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走自己的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中国人民,紧扣实际,善于学习和借鉴西方发展模式的有益经验,谨慎而又实事求是地进行制度创新,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超越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旧有模式,开启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突破了封闭僵化、因循守旧的传统模式,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澄清了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争议,从整体上、战略上赋予了社会主义制度新活力。

四、突出人民主体性,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人民主体性是中国道路的基本主旨和特征,人民的理念始终贯穿于改革开放40年中国道路的整个探索过程中,贯穿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发展之中。人民,不仅是中国道路的认知主体与实践主体,而且是中国道路的目标主体。

(一) 集民力、聚民智,人民群众是中国道路的主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直接参与的大工程,人民群众是中国道路的实践主体。作为中国道路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相信人民,依靠人民,通过各种方式调动人民群众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创造各种平台与环境让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得到充分发挥。人民群众正因为被赋予了中国特色道路的主体地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其聪明才智受到了激发,迸发出无限的创造力,创造了丰硕的改革发展成果,民智与民力的作用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4],是群众智慧、集体智慧的结晶。可以说,亿万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构筑出坚实的中国

道路,人民群众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出发与新时代再出发的源泉和力量。此外,人民群众还是衡量中国道路成败的主体。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不仅是判断改革和建设成败的标准,同时也是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标准。

(二) 惠民生、促民享,人民幸福是中国道路的目标

人民群众是中国道路的目标主体,中国道路的根本目的是造福人民,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最终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中国道路的开创与起步首先缘于人民对实现温饱的渴望。改革开放前,温饱是中国人民几千来努力追求而又未能实现的民生梦想。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第二代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到,人民生活中实际存在的温饱等问题不是光靠主观意愿和政治热情能解决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实现人民的幸福,归根结底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于是,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入手,拉开了以人民幸福、共同富裕为旨归的改革开放的序幕。从实现温饱到小康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始终以人民最需要最迫切的问题和领域作为突破口,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切实得到了不断的改善和提高。当前,中国道路越走越宽,惠民生、促民享的脚步也不断前进,整个发展更加注重社会的公平正义,更加强调改革发展成果全民共享,把共享理念列入五大发展理念之中,中国进入了以共同富裕为追求目标的共享发展新阶段。

五、强调独立自主,又积极融入世界发展潮流

(一) 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与治权完整

百年屈辱的历史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深知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独立自主地走中国道路。在发展中,中国十分注重国家主权的独立和治权的完整,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根据自身的实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其他国家对中国“模式输入”,不允许外来的任何干涉与侵犯,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维护本国内政外交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依附于任何国家和集团,推行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义正辞严地对外来的各种挑衅给予有力回击。在打开国门的同时,我们充分认识对外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始终把现代化建设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的力量上,注重维护和增强本国独立自主的发展权利和能力。在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技术的同时,加强本国的积累,不断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防止发达国家利用资本优势和技术优势控制我国的经济命脉,并把提高出口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增强自身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综合优势。

(二) 对外开放,充分挖掘现代化的后发优势

中国道路强调独立自主,又积极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强调中国的发展要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世界发展潮流。中国道路开始于对世界发展主题的正确判断。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又正好遇上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浪潮,且赶上了以智能化为中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抓住这一发展契机,以平等开放的心态,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虚心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现代化先进经验,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站在“两个市场”的高度,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为中国腾飞带来强大的动力。短短40年,中国就从一个人民温饱都没法解决的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GDP总量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走过了先发现代化国家100~200年才走完的历程,成为世界上最有经济竞争力的国家之一。中国在融入世界发展潮流的同时,极力发挥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力,诸如通过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建设,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促进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塑和世界发展新秩序的构建。

六、利用“试点”实践,走渐进式的改革发展道路

(一) “摸着石头过河”,以“试点”的方法进行探索与积累

40年前,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我们既没有马克思主义现成理论的指导,也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功的先例可供借鉴,而不改革又只有死路一条,因此我们只能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进行摸索和积累,

从而走出一条融实践性与独创性为一体的中国道路。其中,“试点”是改革的重要方法之一。中国共产党人一向重视实践的检验作用,始终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项新的政策方案即使经过专业缜密的论证,倘若未经实践的检验,都蕴含着失败的风险,如果就此在全国范围内施行,一旦出现问题,整个社会可能要付出巨大的实践成本。为了节约实践成本,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中国改革以“试点”作为重要环节。比如当前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3年先在选定的县市进行试点,并及时总结试点经验,2007年才由试点向全国推开,2008年该制度覆盖超过8亿人,基本实现全覆盖。中国的改革大部分都是这样,先在小范围内进行试验实践,对试验结果进行检验,成熟的就推广,不成熟的就修正,不合适的就叫停,并在此过程中不断进行创新。这种“试验—修正—再试验—再修正”的试点方法为大范围改革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为全面改革的顺利进行博得了时间和空间,从而实现了中国改革以点带面的整体突破。当前,中国的改革已从最初大胆试、大胆闯的局部改革走向全盘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改革更加注重系统性、全局性,从试点、成熟到推广的时间也大大缩短。今后,中国的改革依然要走试点改革与整体推进相结合的道路。

(二) 循序渐进,走渐进式的改革发展道路

“试点”的方法和渐进的方式相结合是中国道路的一个重要特色。改革主要有激进式和渐进式两种方式。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之初,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选定并坚持走渐进式改革之路,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不搞突发式,不一步到位,而是在确

保国家安定团结的局面下一点点突破,一步步改革,从易到难,循序渐进,逐步形成今天全面改革开放的局面。具体而言,中国的改革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从农村起步,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经济改革后其他领域的改革,以经济领域带动其他领域,开启一场波澜壮阔的全面改革。中国的对外开放也首先从设立经济特区开始,从沿海开放到沿江沿边开放,从东部向中西部扩展,从“请进来”到“走出去”,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伟大局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关于制度变迁的唯一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要掌握的,这就是制度变迁中的绝大部分是渐进的。”^[5]对比前苏联和部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激进式改革以及他们在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和失败,中国40年渐进式改革发展道路无疑是符合中国实际并且成功的,它已为中国带来了持续稳定的发展,并将继续推动中国向前发展。

七、结语

改革开放4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传承和借鉴的基础上,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丰富了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多样性,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开拓进取精神和创造力。与别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相比较,中国道路的特色是十分鲜明而突出的。当前,认真研究中国道路,总结中国道路的主要特征,增强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中国道路仍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具有动态发展的特性,所以对中国道路及其特征的认识也应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进行概括、总结和深化。

参考文献:

- [1]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89: 43.
- [2] 鄢一龙, 白钢, 章永乐, 等. 大道之行: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63.
- [3]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4]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30.
- [5] 道格拉斯·C. 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119.